



中国修辞  
演变史论集

ZHONGGUO XIUCI YANBIAN SHI LUNJI

宗廷虎 陈光磊 高万云 编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修辞演变史论集 / 宗廷虎, 陈光磊, 高万云编  
著. —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22. 6  
ISBN 978 - 7 - 5553 - 7321 - 6

I. ①中… II. ①宗… ②陈… ③高… III. ①修辞学  
- 汉语史 - 文集 IV. ①H15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03989 号

**中国修辞演变史论集**  
ZHONGGUO XIUCI YANBIAN SHI LUNJI

宗廷虎 陈光磊 高万云 编著

---

出版: 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市同志街 1991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印刷: 长春市宏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数: 395 千字

版次: 2022 年 7 月第 1 版 202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553 - 7321 - 6

定价: 68.00 元

---

# 序

濮之珍

2020年是陈望道先生(以下简称“望老”)进入复旦大学从事修辞教学、研究100周年。复旦的修辞学研究在望老的教育、带领下,逐步走上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望老的《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里程碑。他对修辞学的重大贡献,举世公认。但他1977年仙逝后,复旦的修辞学研究能否继承与发扬他的修辞学思想,不断开辟新领域、延续辉煌?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望老的学生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等带领的修辞学团队,四十多年来,不断向世人交出了答卷。他们对望老的修辞学理论加以阐扬,对修辞学史和修辞史深入开拓、创新,对语体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加推进。就“史”的研究来说,宗、陈两位用力尤多。前二十几年,宗、陈率领的团队主攻的是“中国修辞学史”;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主攻的则是“中国修辞史”,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前几天,宗廷虎来电话说,2020年是复旦大学修辞学研究值得纪念的一年,他和陈光磊想主编两本书,分别对他们在上述两个领域的耕耘进行回顾与总结,并请山东大学高万云教授一起参与编撰。今年他们准备先对中国修辞史领域的新开拓编撰一本《中国修辞演变史论集》,想请我为此书写序。因为我20世纪60年代初,曾是望老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组的指导老师,对指导与带领他们学习望老的修辞学思想起了一些作用。回想1955年语言研究室刚成立时,曾约请了一批兼职教师,我记得有郭绍虞、吴文祺、

李振麟、胡裕树等老师，校外还有周有光、倪海曙老师，现均已作古。目前我是唯一还健在的了。我当时只有30多岁，今年已98岁高龄。作为历史见证者，为望老修辞学思想的继承、发展以及望老精心培养青年学生的事迹，提供旁证资料，也是义不容辞的。更令人高兴的是，这证明望老开启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这部《史论》之编，是对20年来复旦修辞学研究团队有关三种中国修辞史著作的回顾和总结，即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五卷本）。它们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的中国修辞史，也是在望老影响下三个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如《中国修辞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往今来的修辞现象演变史；《中国集句史》是我国第一本专门梳理“集句”现象的修辞史；《中国辞格审美史》是我国第一部对修辞学与美学进行互动交融探索的修辞史。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继承与发展了望道先生修辞学思想，持续创新，对中国修辞史研究作出了多角度的开拓。

从1920年望老应聘来复旦大学任教，开设修辞学课程，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由孕育、建立到发展，并延伸至今，恰巧一百年。百年间，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对全国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约有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30年代，望老的里程碑著作《修辞学发凡》问世；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望老的一批文章与演讲对我国的修辞理论作了深入探索，开拓了修辞学理论的新境界；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带领的复旦修辞学团队，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成果开拓了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在语体风格研究上也有了新进展；四是新世纪头二十年，宗廷虎、陈光磊带领的团队，又以多角度、多层次的系列成果，对我国修辞史这一新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前两个阶段的重大贡献，是陈望道先生亲力亲为；后两个阶段的成果，则是复旦大学修辞学团队继承与发扬望老倡导的创新精神，长期拼搏交出的答卷。正如《修辞学发凡》早就教导过的“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若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sup>[1]</sup>。这个修辞学团队40多年来，遵照望老的教导，不断进取，努力创新，开拓了“中国修辞学史”与“中国修辞史”等新领

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同时也使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于望老逝世后依然能受到学术界重视，这是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的光荣！我相信，不论是复旦修辞学研究的后继者，还是全国各地的修辞学研究者，只要能够发扬这种精神，同样能大展宏图，攻克更多的薄弱环节，开拓更多新领域，推动中国修辞学的前进。而当代我国修辞学蓬勃发展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望老关于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理念、创新道路、方法的论述，不仅对修辞学研究有重要启示，而且对整个语言学研究也有重要启示。如1957年他对复旦中文系学生所作《怎样研究文法、修辞》的演讲，再如1964年在杭州大学的演讲《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等。其实望老的一生，对语言学的多个领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曾在《陈望道先生对语文研究、语文改革的重要贡献》一文中说过：望老曾是复旦大学校长，曾“担任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他带领上海语文工作者，努力贯彻党的语言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sup>[2]</sup>。其实不论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还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都是前人未曾深入系统探索过的领域。望老之所以能在这几个方面取得成就，也是他发扬不断创新精神的结果。望老一系列创新理念、创新道路和方法，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学理论。若能为语言学科如语法、语音、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等更多领域所吸取，也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百年发展，给我们带来众多宝贵的启示。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他的修辞学思想，并予以发扬光大！

2020年6月26日于复旦宿舍“嘉华苑”，时年98岁

#### 注释：

[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结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濮之珍语言学论文集》第36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濮之珍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语文学会前会长，2016年荣获第一届上海市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本文先刊于《文汇报》2020年11月24日）

# 绪 论

宗廷虎 陈光磊

这本《中国修辞演变史论集》编撰于2020年。2020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100年前的1920年春，陈望道先生(以下简称“望老”)在家乡义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一个全译本)后，即来上海。9月，应聘赴复旦大学任教，在中文系开设了“文法”“修辞学”“作文法”等课程。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从此萌发、形成和发展，至今长达100年！这本《中国修辞演变史论集》就是对新世纪以来，复旦大学修辞学研究团队在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培育、指引下，致力开拓“中国修辞史”研究新领域的回顾与总结。同时，也是对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百年发展历程中，后20年持续创新的述要记载。

## 一、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史研究新开拓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思想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早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与今话文的修辞学书”<sup>[1]</sup>，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里程碑。但望老仍未停止研究的脚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校内外的一系列学术演讲，对修辞学的对象、性质、特点、创新道路、方法等众多理论问题进一步作出新的更深刻的论析。这是他修辞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新发展。他的修辞学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不断引领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我们于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望老所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工作。为方便望老授业解惑，研究室设在望

老府邸的楼下。所以我们有幸当面聆听望老多年的讲课，耳濡目染，深受望老修辞学思想的培育、熏陶，获益终生。望老仙逝后，我们的研究在他的修辞学思想引领下砥砺前行。本世纪初二十年的“修辞史”研究即是如此。

### （一）陈望道修辞学基本理论的引领

陈望道修辞学基本理论对修辞史研究的引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修辞学发凡》与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演讲所建构的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引领。这个理论体系由阐明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范围、研究方法以及修辞现象的类别、特征等构成，形成了我国修辞学第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修辞学体系的理论精髓：如修辞研究的极值原则：“（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应的是题旨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借，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如“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sup>[2]</sup>，再如指出修辞学虽属语言学范畴，但它又是介于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sup>[3]</sup>等。三是望老多年来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引领修辞学研究。正如他在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说：“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sup>[4]</sup>我们力求将望老的修辞学理论具体运用于修辞史的研究之中。以《中国修辞史》为例，首先，注重建构一个修辞史的理论框架。我们不仅在《导论》中论述了修辞史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任务、方法、修辞史与修辞学史的区别与联系等基本理论问题，而且在各编（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修辞史与篇章结构修辞史）的《绪论》《结语》中，将上述理论具体化，论述了本编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演变轨迹以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其次，以第四编《辞格演变史》为例，每个辞格设置《引言》《结语》，专门论述本辞格的定义、分类、修辞功能、演变发展脉络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再如《中国集句史》一书，也同样如此。这都体现了我们力图建立一种多角度研究修辞史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显示了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在“修辞史”研究领域的引导力和具体化。

### （二）陈望道修辞理论、美学理论结合交融下的共同引领

我们的《中国辞格审美史》主要是在陈望道修辞理论与美学理论共同引领

下产生的。这也是修辞学与美学互动交融的跨学科研究。望老在《发凡》里已经对修辞与语言美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说美学研究是他修辞研究的重要辅助。我们认为修辞学与语言学之外的美学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除望老的修辞学理论外，他的美学理论，尤其是《美学概论》中有关美的内容、美的形式、美的分类等理论，关于美的“反复与齐一”“对称与均衡”“美的繁多统一”以及有关美的六大分类等理论，都是我们研究种种修辞方式美质的直接导引，从而使本课题研究中修辞学与美学的互动交融结出硕果。

我们于《中国辞格审美史》的《绪论》中阐述了汉语辞格审美的系列基础理论。例如辞格的定义(突出“呈现美感魅力的话语模式”)，辞格的特征(具象性、体验性、情感性)，辞格形成的基础，辞格审美形成的两大机制，以及辞格呈现的六大类美质、汉语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等，都是对望老修辞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在汉语辞格审美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与阐发。同时在每一章辞格审美史(如比喻、夸张、引用、排比等)的《导论》《结语》中所阐述的基础理论，都无不透露出望老修辞理论、美学理论的光辉。

### (三)陈望道创新理论的引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望老在修辞学研究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对我国修辞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望老在语言研究室讲话中曾多次强调：“研究工作要有创造性。我们是创造财富的，不是专门继承的，还要创造，要对祖国文化遗产有所贡献。”<sup>[5]</sup>望老把科学研究分为“继承性研究”与“创造性研究”两种，主张要在继承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研究。<sup>[6]</sup>搞科研一定要有立大志攻坚、敢啃硬骨头的创新精神。他希望我们“要像接力赛跑一样，不是从前人的起点起步，而是从前人的到达点起步。这样才能越跑越远，越往前走水平越高”<sup>[7]</sup>。他于1965年9月20日在研究室同陈光磊等研究生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中国学术史”研究。这些教导已成为我们一生中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

我们之所以下决心探究“修辞史”课题，也是受到望老创新理论的鞭策。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于20世纪已取得可喜的成就，然而与“修辞学史”成为双翼的“修辞史”领域却一直乏人问津。这种“修辞史”研究滞后的现状亟待改变，否则会影响修辞学与修辞学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华裔著

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就在《修辞学习》杂志上呼吁，希望有人填补“中国修辞史”研究的空白。但多年来一直无人响应，主要因为这一工程的浩大而艰巨令人望而却步。2000年，我们攻治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业已出版，宗廷虎考虑到我国修辞学研究的需要，决心与陈光磊先生共同组织团队来闯这一难关。于是即函告郑先生。先生“看信后大喜过望，心想，终于有人想啃这块硬骨头了！……当即复函表示赞赏和支持”<sup>[8]</sup>。我们团队经过七年的奋斗交出了《中国修辞史》答卷。这是我国第一部修辞史，接着又交出《中国集句史》《中国辞格审美史》等答卷，也都是各自领域的第一部，均为修辞史领域的研究作了一些铺路的工作。

## 二、坚持“史论结合”的撰写原则

“史论结合”，原本是我们以前攻治“中国修辞学史”课题过程中所遵循践行的一项研究原则、方法。望老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校内外所作的系列学术演讲，一再强调科学研究中“材料”与“理论”的重要。他指出：从事语文研究，一定要“以中国的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语文实际，从实践中探索语文规律，发现语文规律”。<sup>[9]</sup>“要特别强调收集材料，从事实出发来分析研究。”<sup>[10]</sup>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修辞研究要全面，不要单研究修辞格，也要研究理论。”<sup>[11]</sup>“在观点上，应该高一些，要重视理论。”“讲修辞，要用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sup>[12]</sup>1977年望老逝世后，1979年胡裕树先生任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主任。当时修辞组准备研究修辞学史课题，胡先生认为应该先研究修辞学理论，因此，他要修辞组从系统学习望老的修辞学理论着手，下一步再探索修辞学史课题。对此，宗廷虎在《胡裕树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出色贡献》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载。<sup>[13]</sup>为此，我们在21世纪初开始探索中国修辞史的20年里始终坚持“史论结合”的撰写原则，重视“史”与“论”二者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

### （一）“论”依存于“史”：“论从史出”

研究修辞史必须正确认识“史料”与“理论”相互依存的关系：“史料”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来源于“史料”；脱离史料的理论会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般空洞之说，缺乏理论思考而堆砌史料难以准确地概括出规律。望老曾说过“实例是很重要的。它是归纳的依据，它有证实或驳倒成说的实力。近人常说‘拿出证据来’，它便是证据”<sup>[14]</sup>。这里所说的“实例”，在研究修辞史中便是“史料”。可见“史料”本身的重要作用。汉语修辞现象源远流长，我们必须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扎扎实实收集丰富而典型的第一手“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归纳，总结出规律，提升为理论。“修辞史”研究的主旨是探索修辞现象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及其演变的动因等，因此它所需探讨的理论是多方面的。而这些理论的产生都必须建立在古今大量典型的修辞现象史料、相关学科的史料与社会文化等方面史料的基础上，否则便是言之无根，立论无据。

例如《中国修辞史》中所总结概括出的有关“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修辞史”“篇章结构修辞史”的发展演变规律都是建立在古今大量典型的修辞史料基础之上的。有关一些基本理论的探索，如我们提出修辞现象的特性：社会性、易变性、美感性、民族性与修辞方式的功能等也是以大量史料作为坚实依据而立论的。

《中国集句史》中除了从史料中梳理出“集句”自古至今数千年的演变规律外，我们还对集句这一修辞现象本质提出新的认识。集句虽然源远流长，历代均有集句作品，但却不受文坛重视，甚至屡遭诟病。如明代胡应麟《诗薮》、清代毛先舒《诗辩坻》等视集句为“诗病”“诗道之下流”“雅道所戒”。我们通过数千年来集句史料的收集、分析，对集句的本质提出新的阐释，即“能动创新特性是集句的灵魂”，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分解—选择—重组”，即分解原作品，选择所需集引之作，进行重新组合，这一过程便是再创造的过程。例如南宋文天祥《误国权臣》：“苍生倚大臣，北风破南极，开边一何多？至死难塞责！”（集杜甫《送韦中丞之晋》《北风》《前出塞》《吴侍御江上宅》）与现代陈禅心《咏高射炮》：“百炮资苦战，中天出火珠。天狼正可射，毛血洒平芜。”（集陆龟蒙、崔曙、李白、杜甫诗句）等例。二是可以将不同诗体、文体实行转换，即重组后可集诗成词，或集词成诗。这也是一种创新。同时关于集句的修辞功能，我们总结出集句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还有抒情言志、记述历史、审美等多种功能。例如文天祥的《文信国集杜诗》200首不仅记述了抗

元斗争史，表达了重大主题，而且抒发了文天祥的爱国情怀，深深地感动了读者。这些从史料出发的观点有力地端正了对集句这一修辞现象的认识。

《中国辞格审美史》研究中也有理论方面的发展，例如归纳出辞格的美质特点为：“表达的适切性”“生动的形象性”“强烈的感染力”“多样统一的和谐美”。对于辞格的形成基础以及各个辞格审美的演变与社会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密切联系等新观点，均从历代的史料中分析、总结而形成。

### （二）“史”不能无“论”：史的研究必须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

“史”的研究绝不是“史料”的堆积、铺排，而是为了探讨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以及客观演变规律等。修辞史属于修辞学范畴，它首先要运用一定的修辞理论。修辞学又是多边性、综合性学科，它又涉及语言学各个学科的理论，以及语言学之外的多门学科理论，如文学批评、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中国辞格审美史》中双关辞格审美的研究为例：第一章《导论》中，须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集有关“双关的定义、类型、形成基础与审美功能”等方面的史料，第二章至第七章须搜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体中双关审美表现的继承与发展变化的史料，第八章《结语》须从史料中总结出双关演变的走向、不同文体中双关演变的轨迹、双关的历史演变与社会文化演变的联系等。以上所有对这些史料的搜集、梳理、归纳、分析、阐明，都离不开有关理论（如修辞学、语言学、美学、哲学、文学、文体学、文化学等）和方法的运用。

### （三）“史论结合”的辩证统一

从上述“论从史出”与“史的研究必须运用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来看，“史论结合”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结合的整体，这就是辩证的统一。首先，“史”是“论”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土壤，是丰富多彩的实践。其次，“论”是识史、辨史的眼光、导向。同时“论”既从“史”的实践、发展演变中概括总结而出，它又反过来始终运用于史料的收集、“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说明”。我们在修辞史的探索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纵观《中国辞格审美史》研究，就是在运用修辞观、语言观、美学观、历史观、文化观等有关多门学科的理论 与多门学科的有关史料（包括修辞现象与非修辞现象）相互结合后提炼、升华而建构出一个较系统的理论框架。

## 1. 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

辞格的结构描述——辞格的审美阐释——社会语境论析。而这个框架体现在表述上则为如下三部分：

### 第一部分 绪论

- (1) 辞格的定义、特征、形成基础
- (2) 辞格的审美观照
- (3) 辞格的审美效用
- (4) 辞格审美的发展演变的内因与外因

### 第二部分 每一辞格审美特点的发展演变

- (1) 导论：本辞格的定义、分类、形成基础、审美功能等
- (2) 每一历史阶段辞格审美的演变(如：先秦、两汉等阶段)
  - A. 本阶段辞格审美的主要特点
  - B. 不同文体中辞格的审美表现
  - C. 小结：本阶段辞格演变的轨迹、辞格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第三部分 结语：本辞格审美演变的总轨迹、不同文体中本辞格审美演变的规律、本辞格审美演变的社会文化动因等

## 2. 理论框架的主要特点

### 第一，多维度地凸现辞格审美发展演变的主线

《中国辞格审美史》的研究主旨是探索辞格结构及其审美自古至今的历史演变规律，因此它的理论框架必须鲜明地凸现出辞格审美历史演变的这条主线。不仅如此，我们还进一步从“历史时期”与“文体”的各个不同视角考察，总结出每个辞格所具有的审美历史演变轨迹。

(1) 每一辞格的整体研究均注重辞格审美史的核心内容，即辞格的审美品质、辞格审美的历史演变、演变的社会动因及演变规律的总结。这三个部分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辞格本体的审美品质是辞格审美历史演变的先决条件，社会文化的演变是辞格审美演变的根基、动因。三者结合则能凸显辞格审美发展演变主线的厚度与深度。

(2) 探索辞格审美演变时，采取“自成系统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勾勒出辞格审美演变自古至今的总趋势，还可以看出每一历史阶段的辞格审美演变倾向。原因是这个“共时”是自成系统的，它包括：本阶段辞格的主要审美特点、审美演变及其演变动因等三项内容。如此便可形成先秦两汉

辞格审美史、魏晋南北朝辞格审美史、唐宋辞格审美史等。

(3)运用辞格审美演变与各类文体的演变相结合的方法，便可勾勒出各类不同文体的辞格审美演变轨迹。每一个辞格都有多种不同的文体作为其载体，因此随着文体的演变与互动，即可探索出多种文体的辞格审美史。以设问辞格为例，可以显现出诗歌体设问审美史、散文体设问审美史、赋体设问审美史、小说体设问审美史、戏剧体设问审美史、政论与新闻评论设问审美史、演讲与辩论体设问审美史、广告体设问审美史、网络等设问审美史。

这种多维度的探索，可以尽量全面地显示每一辞格审美历史演变规律的种种形态。

## 第二，注重史料基础上的理论阐释与探索

(1)多方位地探索与阐释辞格本身的审美品质。如辞格的特点(运用特定手法构成的结构模式)、形成基础(哲学、美学、心理、语言基础)、辞格审美的形成机制(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与语言的美丑由是否适应题旨情境而定)、辞格美质的呈现(六大分类：自然美与人为美、空间美与时间美及其混合美、静美与动美、各种感觉美、形式美与内容美、情趣之美)等。必须注重从理论上阐释辞格本身具有多方面的美质与深厚的文化意涵，才能为它的审美发展演变的研究奠立厚实的根基。

(2)阐释辞格审美特征的建立有赖于辞格本体的结构模式，从而确立了辞格结构模式的演变是辞格审美演变的存在基础。这就有助于辞格审美演变规律研究的客观性，避免主观随意性。

(3)从修辞学与美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互动交融中探索辞格审美的演变规律，为以后进行跨学科研究作出宝贵的尝试。

(4)从辞格审美的演变与社会文化演变的互动联系中阐述辞格审美之所以演变的动因，既系统地描述出辞格审美的演变轨迹，又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人民群众历代运用言语的智慧与创造力。

傅惠钧先生在《从学科交融互动中寻求辞格审美的发展规律》中评论说：“本项研究的开拓价值最突出的在于构建了一个辞格审美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对比喻、夸张等一系列辞格审美的历史发展规律作了详尽、系统、深入且各具创新意义的描述与探讨。”<sup>[15]</sup>

### 三、探索视角与路径的多维度

#### (一) 研究视角的多维度

望老曾明确提出“修辞学是介于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论点。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来宗廷虎等人曾写专文探索修辞学理论与哲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理论的密切关系，修辞学的边缘性、多边性、综合性性质已成为很多人共识。我们在研究修辞史过程中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表现之一，便是注重视角的多维度。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修辞现象本体研究的多维度

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是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因此首先需对修辞现象的本体要有正确的认识。修辞学既然是多边的、综合的学科，那么对修辞现象本体就不应该从单一的视角去考察，应该作多视角的探索。首先对修辞现象从其本质、特点、分类、形成基础、修辞功能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再则是对上述的每一方面也作多视角的考察。例如：

**修辞现象的本质：**修辞现象是人类在劳动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过程中产生的，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发展，因而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智慧的创造；既是追求表达效果的语用策略，又是思维法式和认知机制的呈现。

**修辞现象的特点：**社会性、易变性、审美性、民族性。这也是从多个不同视角考察的结果：从修辞现象与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修辞现象在交际中为适应题旨情境的变化而常变常新的特性；从人们运用修辞现象的目的为影响听读者，因而修辞现象会呈现多种美感元素；从修辞现象与不同民族的文化、思维、生活等关系密切，常会打上民族的烙印；等等。

**辞格的形成基础：**从多视角考察，可以发现种种修辞现象尤其是积极修辞，其形成基础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基础，还有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基础。这大约与修辞现象的本质、特点密切关联。哲学基础方面，如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和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的原理、中庸之道、圆道之说等，均分别成为夸张、引用、对偶、双关、回文等辞格形成的有关理据。

心理基础，如相似联想、关系联想、对比联想等与比喻、列锦、通感等辞格关系密切。美学基础方面，如多样统一或繁多统一、对称、对比、平衡与匀称、齐一的多数、反复与齐一等美学原理以及对崇高美的追求等形成之排比、对偶、复辞、设问、夸张等辞格的审美性能。不仅对辞格的形成基础可以做多角度考察，而且对辞格形成的某一基础也可多视角阐述。如复辞的美学基础有三方面：一是“基于反复”，因为“反复的运用符合‘反复增添美感’的美学原则”。二是“出于变化”“复辞的运用同时追求变化灵动的美感，反复之中有变化是复辞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因为复辞的变化既体现在量、位置及意义等方面，也体现在语音美、语形美、语义美等多个方面。三是“感于视听”“按照陈望道先生对美的六种分类”“复辞具有视觉美(空间美)和听觉美(时间美)”。同此，排比辞格亦从“平衡与匀称”“多样的统一”与“齐一的多数”等三方面探索了它形成的美学基础。这种多视角的考察显示了汉语辞格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活力、魅力。

辞格的审美功能也必需多视角探索。辞格的结构模式是多样化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发展变化，因而建立在多样、多变的结构模式上的审美特点必然是丰富多彩的。这就形成了辞格审美功能的多维度。这也决定了我们研究辞格审美功能必须是多视角的。例如复辞的审美功能：“语形美：同形复现，铺排壮观的视觉美。语音美：同音叠响，韵律有致的听觉美。语义美：同中有变，理致周密的意蕴美。”双关的审美功能：“含蓄美、谐隐美、机巧美。”夸张的审美功能：“突出客观的特征美质、抒发主观的强烈美感、展现审美的价值取向。”对偶的审美功能：“装饰功能(对称美、均衡美、自然美、华丽美)、观照功能(典雅美、庄重美、和谐美、滑稽美)、完形功能(含蓄美、意境美)。”列锦的审美功能：“拓展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空间、制造画面效果、创造某种意境。”通感的审美功能：“以不同感官域词语的超常搭配形成新异、奇特的审美效果、不同感官特点叠加的意象美。”以上各种辞格的审美功能所具有各自不同的多样化的特点，正显示了不同辞格具有不同审美个性，其审美表现丰富多彩及其审美功能亦多样化。

## 2. 修辞现象演变规律及演变动因研究的多维度

“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考察、描述、阐释修辞现象的兴替变化，进而认识其严谨的规律。”<sup>[16]</sup>而修辞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个多种元素有机结合的系统。《发凡》曾指出：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所需适应的是题旨情境。由此可见，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我们既要从它的内部因素考察，也要从它的外部因素考察。而且不论内因或外因，都需作多元的考察。

内因方面，主要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方面做多角度考察。例如汉语声、韵、调的音节结构及其历史变化，就形成了异音相从的平仄调配和同声相应的押韵和谐的语音修辞的特点及其逐步演变。例如方块汉字单音独体、多义兼容的特点及其历史变化，可造成析字修辞格的丰富多彩与历史进展。再如汉语语法结构不重形式标志（基本上没有形态变化），而其话语组合却颇讲究形式配置，使得对偶、排比等修辞方式尤其发达且历史悠久。总之，汉语语言文字为修辞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凭借，并且成为辞格的文化基础之一。我们从语音、词汇、语法与体裁形式遗产等多方面探索才能较全面地发现修辞现象演变的内部规律。

外部因素更为复杂多样。修辞现象作为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需要、发展而产生、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把修辞现象的演变置于社会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例如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学术思潮、民俗文化、审美文化、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传播的载体与媒体以及外来文化等等均对修辞现象的演变产生影响，同时修辞现象的演变也会反过来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例如在《中国辞格审美史》中，我们从多视角探讨中国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演变的联系与互动关系后，既可以说明辞格审美演变的多种态势，又同时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就有助于对修辞史作较全面、深入和立体的探索。

## 3. 建构多层次的理论阐述

修辞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建构多层次的理论阐述。现以《中国修辞史》一书的论述为例。

第一层次的论述是《导论》中阐述的：修辞的定义，修辞现象的特性，修

辞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目的、方法，与社会文化互动的关系，等等。

第二层次的论述是本书的五编(语音、词汇、句法、辞格、篇章结构修辞史)各自的《绪论》《结语》中阐述的：各编研究的对象、特点、研究方法、自身的发展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关系等。

第三层次的论述是第四编《辞格演变史》中12个辞格演变史的《引言》《结语》所阐述的：本辞格的定义、特点、分类、发展脉络、形成理据、修辞功能、古今有关理论、辞格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

以上三个层次的阐述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位层次的论述对下位层次的论述起着统括、导引作用；下位层次的论述，既须从属于上位层次的逻辑管辖，又要具备自身的特性。例如第一个层次指出：修辞史研究的对象是修辞现象的演变。第二个层次指出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则分别是语音修辞的演变、词汇修辞的演变、句法修辞的演变、辞格修辞的演变、篇章结构修辞的演变等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都属于“修辞现象的演变”。它们分别是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修辞史、篇章结构修辞史的研究对象。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对象”，以辞格修辞史为例，则是“比喻、引用、借代、比拟”等12个不同辞格的演变。这12个辞格的演变则是既从属于“辞格修辞的演变”，也从属于“修辞现象的演变”。这三个层次的论述紧密相关。它们的视野由大至小，由宏观至微观，因此可以说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紧密关系。

## (二)探索路径的多样化

### 1. 《中国修辞史》以特定的修辞现象和以朝代为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我们曾在《中国修辞史·导论》中说明：研究修辞史一般有多种写作路径，如主要以朝代为纲，或主要以语体、文体为纲，或主要以朝代与语体为纲，或主要以特定的修辞现象或修辞手法为纲，等等。此前系统的修辞史研究几乎是空白，无先例可循。本书的内容包括语音、词汇、句法、辞格与篇章结构等五方面的修辞史。如果每一方面均作全面研究，时间与人力都不允许，因此我们采取了以历史时期为纲与以特定的修辞现象为纲并存的写作路径。其中语音、句法与辞格修辞史侧重于朝代，词汇与篇章修辞史则侧重于特定的修辞现象。例如语音修辞史是以历史时期为经，以特定历史时期中典型文体为纬，经纬交织。其目录为：先秦语音修辞(以诗骚、诸子散文、历史散文